

周祖谟

语言文字论集

周士琦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

周士琦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周士琦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107-12929-5

I.周…

II.周…

III.汉语-语言学-文集

IV.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501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1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0 001~1 100 册

定价: 23.60 元

前 言

本书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的一部有关语言学、文字学的论文选集，读者对象主要为中小学语文教师及语言文字工作者。

先父周祖谟先生（1914年11月19日—1995年1月14日），字燕孙，北京市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中国音韵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编委会副主任，《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汉语大字典》学术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周先生从1938年起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执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他学识渊博，曾开设的课程有语音学、音韵学、比较训诂学、《说文解字》研究、甲骨文研究，现代汉语、汉语史、语言学要籍解题等十余门，颇受学生欢迎。治学自出机杼，多有创见，以严谨著称，为文清通简要，终生著述不辍。他虽然以音韵学名家，但在文字、训诂、辞书、目录、版本、校勘、历史、诗词、书法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著作等身，已刊行者有《广韵校本》《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唐五代韵书集存》《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方言校笺》《尔雅校笺》《问学集》《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洛阳伽蓝记校释》《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语文论集》等十余部，功力深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学术界所称道。

本书由我承乏编选，从周先生的几百篇论文中精选56篇，结为一集，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公开发表过，也有一部分论文是首次

2 ——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

公开发表。入选的论文以短篇为主，以普及性、知识性为主，兼顾提高，内容以与语文教学有关者为主，兼顾其他，庶几能全面提高读者的水平。论文的写作年代从40年代起，直至90年代。本书的论文以类相从，大致按总论、语文教学、汉语规范化、语法、词汇（训诂）、方言、辞典、汉字、语音（音韵）、诗歌的顺序编排。论文的内容一仍其旧，未加删改，只做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加题注，标明该文的写作年代、发表日期、发表于何处等等。除个别题注为周先生原文所有之外，绝大多数题注均为编者所加。（2）加标点，有的论文写于40年代，原文未加书名号，为便于读者披阅，则由我补标。（3）对原文中与今日要求不符的文字加以改动。如：按新颁布的简化字表的规定将有的“象”字改为“像”；将数目字一、二、三……改为1、2、3……等等。（4）有些问题需要说明时，在小注上加“编者按”予以说明，如汉字读音之变化，人名之注释，书籍之版本等等。（5）对原文的笔误和印刷原件上的误植加以订正。

承蒙人民教育出版社慨允出版本书，邢克斌、谭桂声二位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编选、标点、注释等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周士琦 1998年12月18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



1980年10月游汉阳琴台



80年代与周士琦在北京大学中关园家中

目 录

汉语发展的历史	1
谈谈古今汉语的几个问题	16
文章与语言	22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26
怎样自学语文	35
怎样学习古典文学	41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48
谈治学的方法	55
写作与修辞	65
语文课的教学法问题	69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	73
关于语言与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问题	84
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一些问题	97
汉语规范化的意义	104
普通话的正音问题	107
论普通话的语法规范	115
汉字铅字字形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121
关于汉语实词分类的问题	127
划分词类的标准	129
副词和连词	133
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	142
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宾语和表示处所的状态语	149
复句和多重复句	155

词汇和词汇学	168
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185
汉语语词意义的转变和发展	193
汉语骈列的词语和四声	200
汉语成语概说	207
《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	214
书刘熙《释名》后	219
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	223
中国训诂学发展的历史	229
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	247
清代的训诂学	251
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	257
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意义	263
词典学	270
“伍记”与《新华字典》	272
中国辞典学发展史	276
近三十年中国语文词典编纂法的发展	281
突出特色和确保质量	288
汉字的产生和发展	291
秦朝统一文字的历史意义	301
许慎《说文解字》及汉字的重要性	307
《说文解字》概论	313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330
中国文字学发展的历史	361
汉字的优越性	374
古代汉语的字音	379
音韵学的内容及其功用	394

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途径	399
关于研究音韵学的几点希望	402
《广韵》略说	405
我和《广韵》	413
中国古代诗歌的比兴和想象	419
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	427

汉语发展的历史^①

一 研究语言历史的重要意义

语言的历史跟民族文化的历史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总是要在语言中反映出来的。过去研究历史的人不十分注意语言的发展和人民活动之间的关系，而研究语言历史的人又往往忽略了人民活动的历史，因此有些连带的问题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研究语言的历史，一方面要探求语言历史发展的规律，用以说明现代语的现象和发展的趋向，并解决语言在使用上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丰富了普通语言学、方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的知识。另一方面是根据不同时期语言发展的情况来从文字语言上去理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活动的历史，包括从生产到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把历史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特别是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也极其丰富，这是世界上罕有伦比的。当前研究汉语的历史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汉语历史可凭藉的材料也最多。在历史上，汉族与国内少数民族的交往，与东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都有

①本文为1979年11月应广东语文学会的邀请在华南师范学院所作的讲演的一部分，1988年11月重订。

许多资料可以参考。可是有关汉语历史的各种文献尚未充分利用。我们必须努力，把汉语历史的研究工作积极向前推进，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语言既然是社会的产物，它跟社会的一切变动都有关系。研究语言的历史必须结合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历史进行研究，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语言的发展有其内部的自身规律。研究语言的历史更不要忘记应当从语言的整体出发，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文字、语音、词汇（包括语义）、语法之间都有联系，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一方面，而脱离其他有关的方面。另外，语言的发展与修辞和逻辑思维都有密切的关系，修辞手段的多样性和逻辑思维的精确性都对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门路放宽，不能局限于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我们要给语言历史的研究开拓更广阔的前途。汉语历史的全面研究还处于发轫前进的阶段，有的部门已经有了好的成绩，但还有不少的部门刚刚在开始。这里只能粗疏简单地说明两三个问题，以引发大家从事研究的兴趣。

二 汉语发展的历史基础

根据考古所发现的大量材料，证明远在 50 万年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人类。即以新石器时代而论，考古工作者在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先后发现各种遗存，包括石器、陶器、骨器、兽骨、蚌壳等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铲、网坠。陶器有瓮、罐、瓶、盆、鬲、甗、纺轮等等；其中有红陶、黑陶、灰陶、白陶，而且有不少是彩绘的。骨器有骨镞、骨针、鱼钩、鱼叉等等。另外还发现有谷壳、菜籽，晚期还有炼铜渣。在很多遗址中还有不少半穴式的房屋、烧陶器的窑场和公共墓地。由此可见居民已经聚居，农业、渔猎、纺织已经逐渐发达，而且晚期还有了冶铜术。这正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面貌。那时的居民就是中国人民的祖

先。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存着，并且创造自己的文化。

汉族既然有极悠久的历史，汉语的起源一定很早。因为语言是人类互相交际的工具，没有语言，社会就不会存在。汉语应当在远古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不过，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当时人所留下的文字记载是商代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商代相当于公元前 17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商代的文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现在所看到的有文字的遗物大都是殷王殷庚以后的东西，也就是商代晚期的东西，约距今三千多年。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就是考察商代的历史和语言的重要材料。我们要追溯汉语最早的情况只能从商代开始。

历史学家根据商代的文化遗存已经确定商代社会是奴隶社会。从商代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知道商代已有了都城；由地下所发现的生产工具和卜辞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而且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冶铜、陶钧的技术和玉石骨器的雕刻艺术都相当高，并且有了历法和掌史册的史官。

商代的文学记载被保存下来而且数量极大的就是甲骨卜辞。卜辞是当时史官为殷王占卜各种事情的记录。卜辞所记载的事情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文辞也很简短，但也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时语言的大概情况。

甲骨卜辞自从公元 1899 年被发现以后，七八十年之间相继出土的总共有 10 万片。在大量的卜辞里，出现的词语很多，语法也并不简单，足见当时的语言已经相当发达。卜辞中的语法结构基本上与后代相同。例如修饰语在被修饰语的前面，主语之后是动词，动词之后是宾语之类，都跟后代一致。有些复杂的句法在卜辞里也出现了，跟后代的书面语言也是基本相同的。在词汇方面，卜辞中所出现的虽然数量不很多，但是汉语词汇中的基本词已经具备。如日、月、南、北、天、帝、春、秋、风、雨、来、往、王、立等等

一直是古今通用的词。从文字、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来看，后代的语言文字无疑问与商代的语言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下面的记载：

己巳王卜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东南西北的次序与现代语相同）

丁酉卜设贞，今春王収人五千正（征）土方，受出（有）又（祐），三月。

乙酉卜大贞，及兹二月有大雨。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隹（唯）王八祀。

我其已旁（祀宾），乍（作，通则）帝降若，我勿已旁，乍帝降不若。

戊辰卜旁贞，登人乎（呼）往伐舌方。甲午贞，其令多尹作王寔（寢）。贞日有食。

这些词句跟先秦古书中的文言都很相近。由此可以了解汉语书面语在商代的时候已经奠定了基础。

商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但语言的产生远在有文字之前。据史书所载，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人和商人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带，推想汉语的发源地就在黄河流域。商代的语言是从史前的语言发展而来的。这种母语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汉语”。

商王为周王所灭以后，周代承接了商代的文化，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周人跟商人不是一个部落，这两个部落的语言有哪些方面不同还很难说。不过，周代的铜器文字（金文）跟商代的甲骨文是前后相承的。铜器上的铭文虽然词语古奥，但跟商代卜辞的语法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周原所出的甲骨卜辞更是如此。由此推想，商周两个部落的语言应当比较接近，都跟“原始的汉语”有联系。

周人征服了商人以后，又征服了许多东方的部落。华夏诸族的不断融合，也就促进了部族的形成。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5世纪）汉族的文化由黄河流域普被到长江流域。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汉语也就不断丰富起来。当时虽然

有许多诸侯国家，方言不同，但经过一定时间的分歧，随着政治、经济、商业、交通各方面的发展，自然日趋接近，并且逐渐融合，以形成区域之间的共同语。

在春秋时代（公元前 722—公元前 481）黄河流域的国家统称“诸夏”，诸夏的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当时是列国争霸的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生产发达，商业兴盛等原因，各地人民的往来剧增，邻近国家的语言会更接近，至少周、郑、曹、许、陈、宋、鲁、卫、齐这一广袤地区有了区域的共同语。这一区域共同语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 481—公元前 221）就发展成为黄河流域以至长江流域的共同语了。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这种共同语就是汉代以后发展为全民共同语的基础。

在汉语历史的发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古汉语书面语言的规范逐步形成起来。这种书面语言也就是后代“文言”发展的基础。如《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战国策》以及《楚辞》等对后代的语言和文学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作品和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辞风格，但语法没有很大的不同，可见当时书面语言已经有比较一致的语法规范。这种规范不是出于人为的，而是以当时的实际语言为根据的。

战国之后，经过秦代的统一，到了汉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在西汉时期，由于政治的统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各地方言在语法方面会更趋于接近，汉族的共同语言应当已开始形成。这在书面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至于各地的口语仍然会保持许多特有的词语，通行在一定的地区之内，语音也差异较大，那只能算是方言了。全民语言自有其一般通用的词汇。汉族全民语言的形成，加强了汉语人民的团结，并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汉以后，中国虽然不断受到外族的侵扰，但汉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系统，并且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向前发展。

三 汉语历史时期的划分

从商代到现在，汉语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都曾经不断地产生过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的前进和人的思维的发展以及语言内部矛盾的统一有关系。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前进，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语言也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这件事实在词汇和用语的递增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人的思维是受客观的存在而决定的。客观的事物有了发展和变化，人的思维也就随之而有改进，日趋于复杂，同时语言也必然日趋于精密和完善。语法的构词法和造句法随时代而有新的发展就与人的思维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还有，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内部都会有种种不同的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不能不有所改变。如语音的同化、异化、颚化，词汇的繁衍所给予词法、句法的影响等等，都是语言内部的改变。所以，语言总是不断地在发展，在改进的。

语言的发展当然是相当缓慢的，不会有突然的变革。旧的不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逐渐消亡和新的能适应需要而又有活力的东西不断地增加，这是语言发展的规律。汉语也正是如此。不过，汉语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仍然可以根据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比较各个时期的一些特点，会有助于理解汉语发展的规律，辨认汉语发展的趋向，解决历史上各时代与语言有关系的问题。汉语的历史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据目前我们的理解，可以初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 上古时期（公元前 771 以前）

这一时期包括商代到西周之末。前面已经说过商人的文化比较

高，周人伐商胜利以后，吸取了商人的文化，在部落融合之中，汉语也就由部落语言向部族语言发展。这一时期主要的文献有商代的卜辞、西周的铜器铭文和《尚书》的一部分。这些文字的记载几乎都是出自史官之手。

商代的卜辞，文句简短，而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基本形式都与后代相同。在句法上，有叙述句、否定句，还有疑问句；既有简单句，又有复合句。文字的形体已经从繁复的图形向简单的结构发展，并且趋向于定型化。使用的文字，在象形和表意文字之外，兼有形声字和假借字。足见殷商时代的语言文字已经很发达。

周人是羌族的一支，原是殷商时代的一个方国，语言未必与商人全同，可是周人灭商以后，受到商人的影响，自然会与商人的语言接近。西周的铜器铭文都比较长，多者达到四五百字，如宣王时的毛公鼎有 497 个字。凡是铭文长的，记载事实的话不多，而以记载言语为主。如孟鼎、毛公鼎、虢叔旅钟、毛伯班毁等几乎全篇记载的都是语言；而且很多铭文有韵语，如大丰毁、宗周钟等器的铭文。由此可见记载语言的文字已经趋于繁复。但文辞比较古奥，虚词出现的也少。今本《尚书》中的《大诰》《康诰》《洛诰》《多方》等篇都是周书，词语与铜器铭文相似。这些记载所根据的语言应当是早期西土周人的语言。东周以后，春秋时代的著作就与此不同了。

（二）上古后期（公元前 770—公元 219）

这个时期包括周平王东迁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这本来是前后两个阶段：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阶段，秦汉时期是一个阶段。不过，这两个阶段是汉语由部族的区域共同语发展为汉族全民语的相连的历史过程，所以归为一个时期。

平王东迁雒邑以后，到春秋时代，铁器的应用已经开始，社会生产发展得很快。列国的封建领主互相争霸，战争频繁，华夏诸族

的语言必然逐渐接近，而形成一种各国土族间共同的交际语，即所谓“雅言”。《论语》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种“雅言”可能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几个大国的语言为基础的。当时诸侯各国的行人专使礼聘往来，问对之际，不能不有共同能懂的语言。到了春秋后期，生齿日繁，除戎狄蛮夷之外，虞夏商周旧族都已融合，通称为中国。北方文化被及南方，长江流域汉阳诸姬和吴楚等国的语言跟黄河流域诸国的语言也必然日趋接近。加之文化不断发展，诵习《诗》《书》的人日多，语法的规范也就逐渐趋向于一致。语法规范的一致是共同语形成的重要标志。

到战国时期，诸侯力征，四方之民接触日广，尽管各地语音和词语不尽相同，而古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已经完全奠定。

春秋战国之间，语言中的词汇有了很大的发展，双音词之增多最为明显。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有“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等一些话，用了很多双音词；在《孟子》里双音词更是屡见不鲜。如道路、仓廩、庖厨、草莱、商贾、寇讎、膏泽、雕琢、繁殖、树艺、周旋、忧患、惻隐、穷乏之类是汉语中产生双音词的一种主要方式。另外，由于农业、手工业和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生物学等的迅速发展，词汇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汉语的词汇也就不断丰富起来，而且大部分的词都为后代所承用。

在语法方面，这期间，语句已由短而长，表示不同的语义和语法意义的虚词也多起来。特别是《论语》《孟子》把语言的虚词记录得最为完备，对后代的书面语言影响极大。在语音方面，各地的声韵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从《诗经》、屈宋辞赋以及战国诸子中的韵语来看，作者非一时一地之人，而押韵的部类基本一致，由此也可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汉语已成为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共同语了。

这期间，在文字的使用上，音同或音近的假借字比较多，有时